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联盟资本主义

——日本企业的社会组织

徐崇温 主编

[美] 迈克尔·L. 格拉克 著
林德山 译



重庆出版社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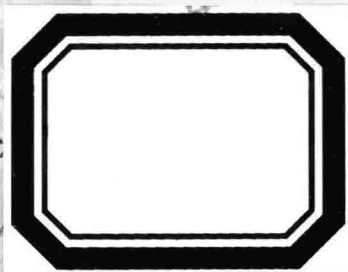
联盟资本主义

——日本企业的社会组织

徐崇温 主编

[美] 迈克尔·L. 格拉克 著

林德山 译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盟资本主义:日本企业的社会组织/(美)格拉克著;林德山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9

书名原文:Alliance Capitalism

ISBN 7-5366-6360-9

I.联... II.①格...②林... III.企业集团—研究—日本
IV.F279.31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7567 号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Michael L. Gerla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2 年英文版译出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联盟资本主义

——日本企业的社会组织

[美] 迈克尔·L. 格拉克 著
林德山 译

责任编辑 吴向阳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306 千 插页 4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ISBN 7 - 5366 - 6360 - 9/F · 312

定价：26.00 元

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在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凯旋进军，还是遭遇挫折，都在相当程度上同是否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关。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9 页）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上，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体现出这种优越性呢？就客观原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就主观原因来说，则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因而体现不出社会主义

的本质,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和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在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认为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下,像俄国这样拥有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又再三再四地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35页)。

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做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当作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页)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同上引第171页)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又特别致力于破除那种离开了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抽象对比的观察方法,坚决实行利用资本主义,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但它毕竟在吸收外国贷款、引进先进技术等许多方面大大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在苏联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拔地而起,在苏联以16.8%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开始,由于斯大林认为干部、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这才开始收缩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使苏联的对外贸易额从1930年的

16.43 亿降至 1939 年的 2.7 亿卢布，外资企业逐渐被取消，外国技术人员纷纷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又压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斯大林还在 1952 年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瓦解，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斯大林文选》下册，第 595 页）。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苏联更加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尔后，这种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叫做“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正是这种自我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大大地拉大了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差距，后来，又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陷于解体的一个经济上的根源。

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时代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而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在生产力方面，它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把高新技术引进生产，使经济获得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产力的总和的话，那

么,从20世纪中期以来,它又创造了超过它自身在以前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它在归资本家私有的企业中推行所有和管理分离以及“雇员持股计划”却又实现有效控股;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发展形形色色的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在消费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它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缓解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上层建筑方面,它建立系统的国家干预机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内构成一个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调节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爆炸。应当说,在这种变化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但面目已非。尽管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它并没有解决同不断发展的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这个矛盾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着;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调整举措,又毕竟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继续发展。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就苏维埃政权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当时的最新成就泰罗制问题指出:“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操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列宁选集》第3卷,第3版,第491—492页)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的上述一系列新的调整举措也应当这样看,这里面,除了包含有我们需要摒弃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伎俩和手段之外,又显然包含有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的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因

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还是世界主题的转换,它们所改变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只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资本主义始终想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轨道;过去它主要依靠拿起武器发动侵略战争来达到目的。现在,则主要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领先地位,控制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接触,把它们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起内应力量,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也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因素,尽管同利用外国资本和科技加速发展带来的积极效果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但要是不予正视,不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任其蔓延开来,却会形成严重冲击,贻害无穷,使社会主义变质成为资本主义的。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第143—144页)而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为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的需要,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推出这套《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这套丛书以翻译国外学者研究当代资

本主义方方面面的论著为主,在适当时候再推出一些我国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我坚信,在知己的同时又知彼,将有助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抓住机遇,又经受考验,从而加快我们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前 言

连接日本公司的一些相互作用模式在政治和经济、国内和国际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令人奇怪的是,人们对其知之甚少。位于日本公司的内部管理惯例与那些显示日本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特征的国内和国际方式之间的当代日本经济的公司间关系,其特征是通过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协商结构表示出来的,该结构使其主要的决策单位陷入了复杂的合作和竞争网络之中。这里所言的包括了同一产业内的公司间的同业公会(**trade association**),跨产业的大规模商业社团(**business association**),由私营公司和政府机构联合投资和组建的特殊公开招股公司(**public corporation**),以及一些重叠的工业、商业和金融联盟。这些调解机构反过来构成并显示了日本市场结构和公司经营的基本特征。

这也许是对这些机构,对公司间联盟进行的一项最为特别的研究。日本的公司有一种强烈的偏好,它们要将自己聚集成一些协调一致的集团,这些集团的隶属公司涉及到了广泛的市场范围:有资本市场中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有初级商品市场中的综合贸易公司

(sōgō shōsha), 有在零部件市场中的分包者(subcontractor), 还有在新技术发展领域中的竞争者。当这些聚集者变成同一类的企业集团(keiretsu)时, 这种模式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些企业集团既包括那些战前财阀(以家族为中心的控股公司, 如三菱和住友)的后代们, 也包括那些依赖于大的生产企业(如丰田和日立集团公司)的、复杂的供应和批发商连锁店。可是, 如本研究的各处所表示的, 公司间的联盟远不仅限于这些最为正规的集团, 事实上, 它渗透到了日本经济的许多方面。

理解这些合作网络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的功能如何, 已变得日益重要了, 因为讨论已经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围, 发展到了公共政策领域。现在, 企业集团和其他的公司间合作模式既受到国外观察者的激烈抨击, 又让其羡慕不已。一方面, 它们被指责为是新来者进入日本市场的重要结构性障碍。由于甚至在 1985 年日元开始急剧升值之后双边贸易不平衡仍在继续, 这种日本公司间的优先贸易被美国谈判者视为市场排斥的主要渊源, 即使在日本政府施行的正式贸易壁垒被拆除之后, 这种市场排斥仍继续存在。一些海外投资者, 如 T. 布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等进行的引人注目但并不成功的尝试更增强了人们的这一印象。这些海外投资者想通过他们在美国同样运用过的那些收购股票和并购机制, 来获取对几家日本公司内部事务的相当的发言权。相关的一个令人担忧之事, 是当日本公司增加在美国汽车和其他行业的投资之时, 它们也把自己的附属公司带进来作为零部件和资本的供应商, 因此排斥了美国的竞争者。

另一方面, 具有极为不同意义的是, 银行、股东和商业伙伴间的密切关系也被视为日本人的竞争优势的一个潜在源泉, 特别是它引导公司的管理者将其活动注意力集中在长期发展、利润和创新的方向上。许多观察家提出疑问, 那种拥有大量分散股东的传统公开招股公司是否还未失去其效用。在以日本银行集团作为研究模型时,

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 1989)谈到了西方“公开招股公司的消逝”,并提倡增加公司所有权的私有化,主张以由金融机构进行的大宗投资来取代成套商品市场,这些金融机构既是那些高度举债经营公司的产权所有者,也是其债务承担者。与此类似,在一期关于当代市场资本主义的特别增刊中,《经济学家》(*Economist*, 1990年5月5日)认为,在填补“资本主义的核心真空”——它是随现代股份公司的兴起而出现的所有权分裂的结果——方面,日本的公司间股权结构比大多数西方经济做得更好。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他(1990)主张在美国的计算机产业建立“美国的企业集团(keiretsu)”,把它作为一种联合金融和技术资源——现在,这些资源分散在风险资本家、处在起始阶段的专业公司和集成计算机制造商之间——的手段,以便更为有效地与那些主宰日本该产业的公司间“综合企业”(complex)进行竞争。那么是否可以说,也许日本已经建立了一套制度,它们改进了公司和证券市场基本机构的功能,并在此过程中一同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些问题切中了日本市场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和特点这一要害。的确,它们提出了在任何经济中有关交换的最佳组织的问题。通过独立的资本市场,特别是通过敌意的收购和其他形式的股东控制的准则方式是将公司活动导向保证总体经济效益的最适宜方式吗?或者其他一些较少破坏性的控制公司管理的机制是更为有效的吗?抑或那些无情的、在竞争商人之间分化的市场不可避免地成为协调商业关系——特别是在一个规模日益扩大、日益复杂、技术变化日益加快的世界里——的最佳方式?或者公司间的合作是同样重要的吗?

当然,没有什么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经济体制需要趋向一种单一的形式。即便是在发达工业社会里,合作的性质及其在经济中的地位也都存在显著的不同。关注这些不同,就需要对市场资本主义的

细节进行详细分析,特别是在贸易、银行业、所有权以及公司间的非正式联系方面。

研究日本问题的一个优势是能够得到研究公司间关系的准确资料,包括学术方面和大众化方面的资料。可是,尽管有丰富的资料,由于存在各种不同的联盟形式和人们使用不同的术语,由于界定会员的困难和由于在考虑它们的性质和目的方面的错误观念,该研究工作也是复杂的。人们经常设定企业集团和其他的联盟形式是独一无二的机制,有明确界定的界限,而事实上其界限常常是模糊的,其从属关系常常是重叠的。因此,对特定企业集群(grouping)的分析还必须要增加对它们置身其中的总体的公司间网络的理解。

采用这种方法,本研究要依靠大量有关日本大公司和美国大公司间的重要商业关系的新数据库,书后的附录对此作了描述。该数据库包括了公司头 10 位股东、其持股数以及所有外聘董事(outside director)的特点和公司所属关系的信息。数据资料已对美国和日本 200 家最大产业公司和 50 家金融机构在连续的关键年份里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编码。对那些日本公司机构,还对这些公司最大的 10 位债权人、他们的借款数以及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的特点等信息作了编码;该信息是美国公司从公开出版物上无法得到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这些资料将用于描绘日本产业组织和公司间关系的基本结构特点,并将它们与美国的同类进行比较。

该数据库有几个显著特点值得注意。首先,通过超越主要商业集群而包括所有大的进行公开交易的日本公司,该数据库回避了此前研究企业集群时的一个共同问题,即预先具体说明集团的成员身份。相反,该数据库依赖总体的网络资料,它使得人们有可能根据经验追溯集团模式,并显示所有日本公司间共同的那些模式。其次,该数据库具有明确的比较性。由于日本和美国的公司采用了同样的措施,这使得人们可以根据几个变量对两国的网络结构进行直接比较。第三,该数据库是纵向的,便于描绘公司间关系随时

间推移而出现的演变,并显示连续性和改变的方式。该数据库的第四个特征是其研究关系的广范围,强调以市场类型划分的一些结构间的相似性和不同之处。

随后的章节将利用这些网络数据库,去追溯范围广泛的各种新发现和结论,其中包括:

(1)说明日本的公司所有制模式基本上不同于美国的所有制模式。第三章显示,大的日本公司的股权大约(a)是美国公司股权集中程度的两倍;(b)比美国股权的稳定程度高4倍;(c)在相同的公司之间同时涉及到的董事会职位可能是美国的5倍;(d)其互换的机会可能是美国的7倍。本研究的许多方面都详细讨论了两国公司基本所有制方面的这些显著的不同。

(2)详细度量日本一系列关系和市场类型中联盟结构的重要性。日本的企业网络显示,在3种关系类型——派遣董事(**dispatched director**)、股份持有权和银行借款——中,它们受到了企业集团的有力组织,而在第4种关系类型(即中间产品贸易)中,其组织则更为薄弱。如第四章所表示的,除了生产贸易外,在任何情形下,同一集团内部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比例是与其他集团公司交易比例的10多倍。这显示了一种极为有力的优先贸易模式,它对我们如何理解日本市场的性质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3)显示这些优先贸易模式是如何自始至终得以坚持的。由于在此所用的数据库从20世纪60年代末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分析能够描绘出一些关系的演变。与流行的观点不同,第四章的结论说明,债务和产权市场中的联盟结构大多得以持久保留,即便是在日本产业的政治和经济大环境下正在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和其他变化中也是如此。

(4)说明日本产业组织的某些重要特征也是日本所有大企业的公司间关系的共同特征。如第五章所表示的,这些包括股权的稳定和互换,以及不同市场类型的交易联系。因此,在日本经济中,联盟

的形式要比一般所认识到的更为普遍。

总的来说,这些结论肯定了联盟结构的存在是日本经济的显著特征,而且它在今天还在继续茁壮成长。它们也表明,需要更为细致地理解这些结构,因为其重要性很大程度上随我们正在讨论的关系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尽管本研究讨论了各种不同的联盟形式,可连接大银行和受到特别关注的工业企业的却是那些多种经营的集群。大的公司在工业化经济中占据中心地位,特别是在诸如金融、基础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等关键部门。即使是在日本,那里的中小企业在整个就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可日本金融资本、进出口、其主要的技术和组织创新的首要来源是大公司部门(Okimoto and Saxonhouse, 1987; Patrick and Rohlen, 1987)。形式上与 6 个最大企业集团之一有背景关系的那些公司尽管只占东京证券交易场所列公司的 1/10,可它们占了总的银行资本的 40%,占某些制造业部门(如钢铁和有色金属)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此外,隶属这些集团的公司控制了日本进口的 2/3,这使得这些集团与那些有志于进入日本市场的外国商人相比占有特殊的地位。

可是,这些公司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了这些比例数字所表示的意义。许多表面上是“独立的”大公司与一个或多个未在这些数字中显示出来的重要集团保持松散的隶属关系。而且,大多数大的公司保持了很大的卫星和附属公司网络,这极大地增加了它们在经济中的总的影响力。日本一半以上的中小型制造企业是一些大公司的分包者,这一小部分的大公司一直在不断增长(Aoki, 1987)。仅东芝在日本就有约 200 家的相关公司(kankei gaisha),在它们下面还有 600 家“孙公司”(mago gaisha)。母公司的成功带来了母公司的附属网络里的其他公司的商业发展,而像东芝、丰田和日立这种公司的失败将会导致整个依赖于它们的企业网络的挫折。

日本的大规模、多种经营的企业集群还引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

性问题，事实证明它们对于理解日本资本主义的特征具有启发意义。尽管那些由来自上面的供应公司和来自下面的批发商所组成的纵向联合企业集团呈现出了公司内部的一些特征，人们把这些特征与典型的等级组织联系起来（特别是一定程度的有关生产决策的集中化，它是由母公司控制的），可市场内的集团却并不容易分类。它们非正式地笼统代表了那些位于不同经济部门的规模大小相当的公司之间的有组织的“网络组织”。尽管人们常常强调这些企业集群的金融地位，可这种作用是与各成员公司在多种市场交叉的复杂关系结构中的商业和行业活动并存的。当这些模式通过交叉所有权而得到加强之时，它们也显示了对日本经济总体“核心”的战略控制。

不过，在表示不同类型的企业集群之间的区别时，日本人的术语含混不清，有点容易让人混淆。日语“企业集团”（*kigyō gurūpu* 或 *kigyō shūdan*）的直译常常用于表示集中在大的商业银行的主要的市场间集群，但它有时也被一些公司用以表示它们自己的卫星公司家族。例如，丰田汽车公司用丰田集团来表示 14 个主要公司，它们大多数是在过去一定阶段由母公司派生出来的（如日本电装公司 *Nippondenso* 和 *Toyota Autobody*）。也许是这种术语变化的结果之一，一些日本学者已开始自己造字来描述这些形式，如按照市场和等级制度表述而称呼的“中间组织”（*chūkan soshiki*），以及“网络”（*nettowaaku*）（参见 Imai, 1989a）。

在承认日益熟悉该术语的同时，我将把纵向联合集团和多种经营的集团都称之为“企业集团（*keiretsu*）”。尽管并非所有的评论者都同意这种用法，可事实是，该术语在日本被广泛使用（例如，在典型的资料来源中，称 *Keiretsu* 而不是 *kenkyū*）。我在用它时加了个必要的修饰语“市场间”（*intermarket*），用以使主要讨论的焦点问题多种经营集群区别于纵向联合集群。另有人把这些集团称之为“横向的”企业集团（*horizontal keiretsu*），因为其成员的规模和地位相